

选择·接受·转化

方长安 著

——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

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张之洞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 全 国 优 秀 出 版 社 · 武汉大学出版社

I209.5

F180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选择·接受·转化

——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

方长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
日本文学关系/方长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6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307-03929-x

I. 选… II. 方… III. ①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③日本—文学—影响—中国—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1367号

责任编辑:高璐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92千字 插页:3

版次: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3929-x/G·621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方长安 1963年生，湖北红安人。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2001年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2002年晋升为教授。已出版著作《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的神韵》（二人合著）、《延安文艺概论》（五人合著）等。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韩国）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近年来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项目以及武汉大学211工程项目3项。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化、文学关系研究。

序

龙泉明

方长安同志在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来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助教班求学；后又于1994年考上武汉大学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仍不感满足，又一举考上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他在武汉大学跟我六年，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六年之中，我们面对面的交谈、切磋与争辩不少，即使博士毕业留校后成为同事，仍然保持着这种关系。就学期间，他相当刻苦、勤奋，读书、研讨、写作，他都抓得很紧，从不懈怠。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很努力，有韧性，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富有钉子精神，一旦抓住某个学术问题或课题，他就会咬住不放，执著地顽强地钻研和探究它，直至完成。正因为如此，他尽管还年轻，但已在现当代文学多个领域与层面有相当扎实而深入的研究，如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研究，下过很深的功夫，由于见解的新颖独到，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后，得到学界好评；他对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撰写过多篇富有见地的论文，后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集出版；近年他又致力于建国后17年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考察，已发表在《文学评论》、《学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韩国）等刊物上的数篇论文颇具新意和卓识，此课题于200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相信几年后会有更厚重的成果问世。当然，方长安真正用力最勤、最见功夫的学术研究，还是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探讨，这可以说是他学术上的重头戏。他抽出近 20 篇论文发表于全国重要学术刊物上，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中日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因由与根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日文学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日本文学向中国文学吸取了大量丰厚的养分，中国传统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文本资源。然而，近代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近现代取得了成功，成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后现代化国家学习的榜样，中日文学关系也随着中日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发生逆转，中国文学开始向昔日的学生日本文学学习。

这种逆转是古老中国面对世界现代性潮流，为求自我新生而做出的一种痛苦选择。向日本文学学习，主要是向日本明治以后文学学习，这在当时意味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自觉。因为日本明治以后文学主要是学习西方近现代文学，而西方近现代文学书写的是西方现代话语发育、萌生与发展的历史。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日本文学仅仅看成是中国文学追寻西方文学及其现代性的桥梁与中介，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事实上正如方长安文中所论述的，日本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具有独立美学品格和鲜明民族个性的文学，它的近现代文学虽然是以西方文学为范本而发展起来的，但它在学习西方时从来没有忘记传统，它的现代性内涵中流动着许多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的血液，它并不等于西方文学，也并非中西文学间简单的“中介”，它是以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姿态而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的。这是方长安对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种突破，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确立了存在前提与可靠基础。

日本近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这种特殊关系，使晚清以降中日文学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对这种复杂关系，长期以来学界有所触

及、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孤立现象、单个作家的平行比较研究过多，往往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翻开 20 世纪前 30 年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中日文学关系并非个别作家与个别现象的孤立联系，而是整体性的持续关系，中国现代最活跃的作家大都去过日本，与日本文学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精神联系。梁启超、黄遵宪、王国维、苏曼殊、李叔同、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夏衍、杨骚、任钧、刘呐鸥、胡秋原、胡风、周扬、钱歌川、王独清、穆木天、汪馥泉、林伯修、韩侍桁、丰子恺等，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日本文学的浸润，自觉不自觉地将日本文学精神化入自己的创作与理论建构中。他们在建设新文学的过程中，时常是以日本文学为参照的。所以，长期以来学界那种将某个作家或现象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从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孤立出来所做的研究，便无法真正揭示出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对近现代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许多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规律、特征与经验教训，往往视而不见，这就遮蔽或削弱了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基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清醒认识，方长安的博士论文《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独具慧眼，选择了从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发展、现代性生长的宏观角度，考察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内在关系，即日本文学哪些因素被中国作家所择取，如何择取、变异、化为自己血肉的，揭示它们在中国文学流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意义，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孤立地研究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局限，揭示出单个现象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例如将周作人倡导坪内逍遙《小说神髓》这一事实，放在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语境中考察，就发现了它对于近代政治宣讲文学向现代人情写实文学转型所起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还原、敞开历

史的真实场景，展示文学史流变的丰富复杂性，深化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发展过程的认识。

作者把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置于中国文学转型与发展的流程中进行考察，超越了一般性的影响介绍，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影响发生的历史语境、契机与媒介。由张之洞《劝学篇》对留学日本的倡导，他发现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甚至依赖心理。而作为中日文学关系桥梁的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失去了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进行冷静的观察、分析，于是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也就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以此对作家们认同、接受的实际情形所作的深入考察与新的阐释，颇多真知灼见。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不仅探寻了中国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接受什么和如何接受、转化的问题，而且特别注重对作家接受过程中主体意识、接受心理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日文化、文学交汇过程中复杂的心理世界，也因此认识到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部作家选择、接受与转化他者的心理流动史。

突出接受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对现代作家创造精神的尊重。这种研究思路进一步证明现代文学既有形态与新传统的形成，与当初作家们在某种心理支配下对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接受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作者有意识地将中日文学关系的探讨与新文学传统之形成结合起来考察，辨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某些新传统之原型及其最初的积极意义和负面作用，如他认为现代文学政治功利性传统的形成及其是与非，同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时接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拓展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空间，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

传统的认识。

在方法论上，作者避免了已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泛泛的平行比较，而是运用影响研究方法，并在大量的史料梳理、史实考订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辨，做到论从史出。经由全面梳理、比较分析，他发现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对立特点。第一，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立足点使认同、接受一方面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换与现代性的生长；另一方面又使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借鉴与参照意义。第二，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在接受日本文学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是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忽略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从而弱化了认同、接受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三，日本近现代文坛始终处于探索状态，变动不居，表现出一种迅速追赶西方的急躁情绪，留日作家因此往往同时受到日本文学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心态，避免了保守、固步自封的倾向；但也导致了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无法沉潜在文学深处进行探寻，以至于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第四，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质疑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是否适合于中国文学，以至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几乎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常常重复着日本近现代文学所犯的某些错误。

方长安的博士论文应该说相当程度地拓展与深化了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水平,并由此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认识。黄曼君先生在论文评阅书中写道:“论文作者理论视野开阔,打破了过去一个中心、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从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现代思维方式出发,多方面地阐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作用……论文资料翔实,用语朴实、细致,整个论文,无论从整体上看,或从细部看都有突破,有创见,有锋芒,但都化为客观的叙述,用事实说话,绝无空论,因而论文显得厚重、扎实并很新颖。”在博士论文答辩时,郭志刚先生称其是他所看过的“最扎实、最厚重、最具学术功力”的博士论文中的一篇。答辩委员陆耀东、易竹贤、黄曼君、孙党伯、陈美兰、於可训等先生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评议方长安的论文为优秀博士论文。不妨将答辩委员会决议抄在这里,以窥一斑:

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变迁,必然要面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论文有较多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了流行的“中介说”,指出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仅是作为西方文学的中介,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直接影响;二是注重从发展转型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学的影响,这切合中日文学关系的实际,显示了一种清晰的历史眼光;三是善于同中求异,既自觉地发掘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的转化,又很注意辨析中国作家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相互间的细微差别,这表明作者具有史识,而且对文本也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辨。论文资料翔实,论述框架合理,文字朴实。论文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所受的综合影响注意不够。本文达到了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答辩合格,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2001 年,该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之后,方长

安依据专家们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反复打磨、修改。2002年6月，该论文经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专家评审通过，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

方长安同志已在学术上迈出了比较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老师和朋友，为他高兴，也向他祝贺！但是，学术无止境，方长安同志学术道路还很长，学术潜力还很大，他应该不停地前行，不断地超越过去，超越自我，真正在学术上开创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获取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我相信他能这样要求自己。

2003年3月于珞珈山敝室

目 录

序	龙泉明
引论	1
第一章 晚清文学变革与日本启蒙文学	16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日本政治小说	17
第二节 诗界革命与日本启蒙诗歌	27
第三节 文界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的文体改良运动	32
第四节 戏曲改良与日本新剧	40
第二章 晚清文学向五四文学转变与日本文学	51
第一节 “国家”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变与日本 白桦派	51
第二节 政治文学向人情文学转变与坪内逍遙的 《小说神髓》	63
第三节 政治宣讲式文学向写实文学转变与坪内逍遙的 《小说神髓》	71
第三章 五四文学建构与日本文学思潮	81
第一节 前期创造社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	82
第二节 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95
第四章 五四文学发展与日本文论	111
第一节 五四文学发展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	111

第二节	五四文学发展与厨川白村的 《苦闷的象征》	127
第五章	五四文学建构、发展中的鲁迅与日本文学	144
第一节	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之关系	144
第二节	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与日本文学	174
第六章	五四文学建构、发展中的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203
第一节	“人的文学”观的形成与日本文学关系	204
第二节	“人的文学”观的裂变、转换与日本文学	215
第三节	平和、冲淡、闲适的散文创作风格与 日本文学	235
第七章	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换与日本 无产阶级文学	262
第一节	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与交往	263
第二节	五四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换与日本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69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界说与日本 无产阶级文学	285
第八章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小说与日本新感觉派	307
第一节	对日本新感觉派的译介	307
第二节	对日本新感觉派形式观念的认同及其意义	310
第三节	对“新感觉”的认同、化用及背离	315
结语		328
主要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49

引 论

中日古典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输出日本接受的单向式影响关系，日本文学的生成、发展深受中国文学甘霖的滋润，其肌体内流淌着中国文学的精血。如《古事记》对某些中国神话传说的再书写，《万叶集》对《诗经》形式的吸纳，《源氏物语》中的《长恨歌》神韵等。然而，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文学开始从昔日学生日本文学那里获取灵感与激情，正如实藤惠秀所言：“从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以前这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① 实藤惠秀此论虽然太绝对，有失偏颇，但他对中日文学交流基本态势的言说，却是准确的。

—

那么，中日文学关系何以发生逆转呢？怎样逆转的呢？或者说，中国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文学何以会回过头来关注日本文学、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呢？

这些看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与两国近代化语境、历史进程、相互关系等相关联。中日的近代化，实际上是被近代化，是在西方威胁、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回应。一定意义上说，近代化就是西化，而中国在历史上与西方的关系，较日

^① [日] 实藤惠秀：《日本和中国的文学交流》，载《日本文学》1984 年第 2 期。

本与西方的关系，远为密切一些，日本在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模仿欧式近现代化的条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②日本人在近现代化事业上却捷足先登，通过明治维新乘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于1894～1895年甲午之战一举击败清朝帝国。

1895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一年，被向来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打败，其震动、羞辱与尴尬体验远较半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败于英国强烈得多。这一年彻底地改写了中日关系史，改变了中国人的日本观。老大帝国“始知国力远逊于日本，但日本在数十年前固无赫赫之名于世界，而竟一战胜我，则明治维新有以致之”，^③羞辱之中一改过去对日本不屑一顾的态度，^④开始关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现代化经验，希望以之为师。

1896年，康有为编成《日本变政记》，次年出版《日本书目志》，后又作《日本明治变政考》，并于1898年2月进呈光绪皇帝，谏其效法日本，进行变法。在他看来，“欧美新法和日本良规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陆”。^⑤同月，竭力于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便“索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⑥“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

①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页。

② 日本学者依田憇家归纳出6点原因。见《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15页。

③ 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④ 美国学者任达认为：“直到1894至1895年开始觉醒前，中国公众意识的视野中，日本仍未存在。”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⑤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页。

⑥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1877年任驻日参赞后，经深入研习，历时9年，于1887年完成的一部50余万字的史书。

再索一部”。^① 光绪此举,旨在经由《日本国志》熟悉了解日本国情,特别是其变革历史,以期获取维新变法的资源。朝野上下对日本态度的这种变化,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师法日本的主要举措有二:一是翻译日本新学书籍。日本新学大都来自西方,中国为何不径取西书,而迂道日本?这一常识性问题,并非没有引起世纪之交危机感强烈、心态焦急的维新派的思考。梁启超曾认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② 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特别强调了翻译日文著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他宣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③ 张之洞虽然在政治意见上与梁启超往往相左,但对于译介日本书籍的认识却极为一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力言翻译日文书籍之必要:“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④ 同年,康有为亦指出:“(日本)其变法至今30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成日文)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译成中文时)其费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⑤ 倡导变革的杨深秀在1898年的奏折中,同样

①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9卷,自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卷,《饮冰室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第54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卷,《饮冰室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第58页。

④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⑤ 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指出了日文翻译之便：“臣曾细研日本变法，如彼邦已译就西方佳著。日文书写与我相同，仅若干文法与我相反，苟经数月研习，即可大致明了，故利于我译（西方著作）也。”^①由此可见，倡导翻译日文书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这实乃民族危亡之际生存智慧的体现。

理论上的倡导导致了日文译著高潮的出现。梁启超曾说过：“壬寅、癸卯（1902~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有统计显示，从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间，由日文翻译的中文书籍仅有12册，且其间只有2册由中国人翻译；而1902至1904年间译自日语著作就达321本，占全部译著533本的60.2%。另据香港中文大学的谭汝谦与日本实藤惠秀等合作统计，1896至1921年间译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书及期刊连载的译著），每年平均63.86本。^②

这些日文译著大都为教育、法律、史志、地理等类书，文学类极少，然而它们对于中国文学转而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作用，却不容忽视。^③它们使国人熟悉了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

① 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② 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③ 当时的译著所使用的基本词汇大都是日本的新词汇，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像、法律、封建、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政治、美术、抽象、现实、科学、观念、政府、资本、商业、数学、哲学、社会主义等。离开这些词汇，翻译以至新的言说，便变得极为困难。它们不单是为当时译介日本和西方作品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将现代思想一同引入到了中国，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本体。从文学角度看，那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汇，为当时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方便，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语汇。所以那些译著从一开始就在为中日文学关系逆转做准备，或者说，在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之前，它们就从词汇的角度作用、影响于中国文学。